

聖嚴法師推動心靈環保

高暄專訪

近三年來，推動「心靈環保」不遺餘力的聖嚴法師，今（一九九三）年開春後，更積極推出各項活動，三月十二日植樹節，他也不忘趁此良機，再向國人強調環保意識。

中國佛教界從事學術研究，並接受正統經院教育，自一九四九年至今，除了當代佛教思想家「印順長老」外，首推聖嚴法師。

他從一個為了嚮往「狼山」美景而出家的小孩，到今日成為佛教界備受推崇的宗教家，實非偶然；因為好思考、反省，願意學習，乃是他這個人的特色，所以到了四十歲，他仍堅決到日本攻讀博士。

《弘一大師傳》的作者陳慧劍說，當聖嚴法師完成博士論文時，學校的同學及東京的學術界都感到不可思議，一個中國人能在四年之內完成博士課程，並獲得文學博士學位，在日本尚無前例；日本立正大學的博士課程開了十八年之久，他的博士文憑編號是第三號，這也是令日本佛學界驚歎的一件事！

如今，他已六十三歲，仍繼續為延續中國佛教文化的命脈鏗而不捨，對於這位當今佛教界長者之一的聖嚴法師，我們特別作了一次專訪。

高暄

（以下簡稱高）

：請談談您學佛、出家的經過？是否自小就有此志向，還是環境因緣所促成？

聖嚴法師

（以下簡稱師）：

我這個人從未替自己打算，即連第一次出家也是如此。

我生長在一個民間信仰相當普遍的鄉間，家人信奉的也是民間信仰，根本不懂「佛教」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九四三年）夏，我十三歲，一位鄰居佛教徒帶著師父給他的任務——往江南找徒弟，這位鄰居從江北找到了江南一帶，正逢下雨，就到我家躲雨。

他見到我，就問我母親，讓我出家好不好？我母親想想，反正家裡窮，也無法供給我一個好的讀書環境，此法或許可行。我一聽要到「狼山」去，還沒弄清楚當和尚是怎麼回事，就很高興地答應了，因為聽父母說過，那個地方就像仙境、天國一般美好。到了山上，一看到房子那麼多，風景那麼優美，又有兩位教我念書的老師，實在太好了。當時在家居士稱老和尚為「老爺」，小和尚為「小老爺」，備受禮遇。

可是沒多久，軍隊來了，整個狼山鄉下都不平安，老師、工作人員全跑了，一下子，小老爺成了小伙計，打掃、除草、種菜、煮飯、挑柴樣樣都要做。

軍隊侵佔了整個狼山，好端端的一座廟被拆得殘破不堪。我們只好到上海另起「爐竈」。到了上海，沒有信徒的支持，沒田產，幾個出家人全靠為喪家伴靈、誦經、做七，賺取生活費，每天在馬路上奔走、送葬。

那段時間，佛經只是念給鬼聽，不是給人聽，我心中感觸良多，深深覺得，佛教的道理應該是幫助人解決問題。

如此度過一年多後，直到民國三十六年（西元一九四七年），我決定到當時上海靜安寺的佛學院念書，經長輩同意後，才得以參加考試，當時我只有小學四年級的學歷，自傳還是老師父幫我寫的。本以為背熟即可應付，沒想到作文題目居然是：「對佛教的期望」，這那是我能夠寫的？寫不出來，乾脆照舊將自傳交上去，後來，還是被錄取了。

剛開始，老師們口音太重，佛理太深奧，教人聽不懂，但我還是認真地做筆記，半年後，就趕上進度，二年後以第一名畢業。

在佛學院這段期間，我扎下佛學根基，瞭解近代佛教、中國社會以及東南亞高僧的狀況，令我大開眼界。

高：戰爭的緣故，您投入軍旅十年餘，來到臺灣後，在名山方丈「東初老人」的剃度下，重披袈裟，可否請您談談與東初老人的因緣，以及他對您的影響？

師：一九四九年我十九歲，大陸局勢急轉直下。此際，我只有從軍一途，加入二〇七師青年軍。記得當時許多佛學院同學都得到師父的經濟支援，我也如法炮製，沒想到要不到錢，還挨了一頓刮，師父罵我：「老和尚不怕死，小和尚倒怕死，要死就死在一塊！」

最後，我還是以出家人身分從軍到了臺灣。這段時間，開始寫文章投稿，這個機緣，使我認識了東初老人。從此，他不斷鼓勵我、關懷我。

決定退伍時，許多老和尚問我，要在那兒出家？我認為在那兒都一樣，當時東初老人對我說：「出家是個人的事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。」加上他那兒環境很單純，我就在他的剃度下，成就了再度出家的因緣。

東初老人對我的影響，非常深刻。他說，人要先把自己管理好，才能把寺院管理好，再擴大至社會、國家、世界的管理。如果連自己都無法管理的話，在其他人事上的管理，就不切實際了。

所以，他帶徒弟非常重視個人的訓練，採用的是「養蜂」的方式，只給「蜂房」，至於如何採食物全靠自己想辦法，採來的食物，不但要養自己，還能照顧別人。

除了供給「住」之外，一開始，他連衣服都不給我一件，當時我已經三十歲，該有能力負責自己的生活，總不能凡事都靠別人吧！用這個方法來訓練弟子，非常好！

高：您是第一位拿到文學博士的出家人，且赴日本念書時已四十歲，不算年輕，在求學期間，經歷不少困難吧？當時究竟是什麼原因，讓您如此堅定負笈東瀛？

師：一九六〇年元月一日，我自軍中退役（當時三十歲），重新剃度於東初老人座下，百感交集，尤其自覺修持不足，對佛法的經、律、論都不夠深入，就先到美濃山中閉關六年。

這段期間，我念佛、拜懺、禪修、閱讀藏經，也寫了好幾本書。當時，我深深感到，弘法的人實在太少了，我應該來做這件事，救濟這苦難的人間。

住山期間，曾讀過許多有關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文章，這些文章中都曾提到中國佛教界沒有人才，佛教徒已不知什麼是真正的佛教，梵文原典沒幾人看得懂等等，這皆非妄言，當時我非常難過，發願要深入精研佛法。

那時日本已有二十多所佛教相關大學，不但科系、課程完備，更有專業教師針對學生個別差異，因材施教。但是，國內卻連一座類似的教育單位也沒有。

因此，我想，若要弘揚佛法，必須學習國外的研究態度與實踐精神，積極培育佛教人才。於是，一九六九年，決定到日本去念書，儘管已經四十歲了，也應及時努力，希望有一天落實這個理想。

到日本念書待了六年，頭二年順利拿到碩士學位，後四年攻讀博士學位。剛開始，我的記憶力及反應的確不如班上年輕人，但我用毅力、時間來克服這些不足，每天什麼事也不做，就是專心念書。

昔日在國內靠自修也為自己奠下學術基礎，加上自己禪定的修行，心靈相當穩定，不至於著急、焦慮，慢慢地克服許多困難。

碩士、博士論文都是靠自己用日文逐字推敲寫成，再經日本友人協助刪改才完成的。當時，我所就讀的立正大學，即使是日本人要順利畢業都相當難。我不但如期完成，博士論文也屢獲指導教授肯定，一致認為頗富創見。

當我快拿到博士學位時，我的師父東初老人給我一句話，他說：「寧可當大宗教家，不要當大學問家或宗教學者。」

這句話對我的影響很深，雖然到現在，我一直在幾個大學研究所當指導老師，但我卻從不以學者自居。因為一位宗教家除應具備宗教學識外，還需要修行，靠著修行，就不會流於自我膨脹、過度自我……，取而代之的反是一份悲天憫人的關懷。

高：近三年來，農禪寺以「心靈環保」運動為主要工作，貴寺也以身作則，實踐簡樸生活，能否請您談談貴寺的環保計畫？

師：近三年來，農禪寺不斷推動環保運動，說實在的，成效還沒有達到我們滿意的程度。

寺院本來就應過著簡樸的生活，和今日提倡環保的大趨勢無關，只是此時兩者互相呼應而已。

出家人的生活，凡事都要從簡，不僅用水、用電求節約，連飲食也如此。一般人不喜歡吃的菜根部分，農禪寺一樣珍惜，去皮後，還是可以煮成美味的湯；發酸的飯也不輕易倒掉，炒過、蒸過，我們一樣吃；至於保麗龍等塑膠用品，寺內絕不提倡，這可從我們一律用不鏽鋼的碗、筷、盤子吃飯得知。

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著手環保，一是物質環境的保護，一是正本清源，從人心的淨化做起；前者治標，後者治本。

如果從心靈的環保做起，我們就會心甘情願，自發性地少浪費自然資源，不是要求別人該如何如何，且會覺得是一種享受，而不是犧牲，從佛教的觀點來看，這就是「惜福」！

因此，農禪寺推動的環保運動，除了從物質層面做起，提供大家「生活環保」的方法外，尤其加強「淨化心靈」的工作。如此一來，人在那裡，環保就到那裡，所以，這幾年來，農禪寺一直努力辦了一系列的環保講座與活動，以提倡心靈環保。

高：將佛法弘揚於美國，是您重要的理想之一，一年裡您待在美國的時間就長達半年，為何您如此重視美國？而今美國道場的發展情況如何？

師：其實，到美國弘法也是因緣巧合，當我在日本拿到文學博士學位時，國內佛教界也沒有人請我回國，連教書的機會也沒有，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。

正巧當時一批華僑佛教徒，請我到美國佛教會推動傳教弘法的工作，便在那邊弘法了一年多，直到先師東初老人——中華佛教文化館創辦人圓寂了，我才匆匆束裝返臺，接管該館及其下院農禪寺一切寺務，為了兼顧兩處，就這樣，我當了十五年的空中飛人，兩地奔波到今日。

目前在美國的弘法，對象主要以英語社會為主，希望未來能擴大弘法範圍，不只在美國，且能擴及英語世界及受其影響的國家。

由於對象不同、環境不同，在學佛的過程中，西方世界面臨的問題，自然和國人有所差異。因此，弘法的內容、出版的刊物及書籍，和國內農禪寺一向出版的也不相同。

現在在美國道場出版的二份雜誌，多以「心靈環保」為主，發行網廣達歐美三十八個國家地區；書籍的內容，主要以我闡述佛法的觀點加以整理而成，以英文版發行。

高：您被公推為當代重要的禪法弘揚者，十五年中主持過九十三期禪七，教授了二萬人坐禪，出版了十五種中、英文禪書，可否請您談談禪坐對現代人的價值？而且您教授的禪坐法仍保持古老叢林式的教法，和時下流行的禪坐有何不同？

師：首先，我要澄清的是，我教的禪坐只保有「古老叢林式」的要求標準，卻不是按照那套傳統形式來教。教現代人學禪，就要用現代人能接受的方式，讓現代人接受古人的模式，並不合時宜。

像農禪寺所開的初級禪訓班，乃是我根據古老叢林禪坐法及佛經內容的精神，再參考現代人的需要加以糅合設計而成，屬於個人自創的禪修法，在古老的禪修活動中，根本找不到。

禪坐對現代人的生活，能產生安定和諧的作用，因為禪法，第一要我們「放鬆」身心，這已是一大享受；第二要我們「放下」身心，就能自在。

坐禪可使我們同樣努力工作，而不受工作限制，能超越人、事、物之上，投入時間的洪流，而不受時間困擾，這就是所謂「出世」的精神。

高：農禪寺所在地北投區的關渡平原，目前面臨被徵收的命運，加上信眾及讀佛研所的學生日益增加，早晚要他遷，據聞，貴寺已在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覓得一塊地，能否請您談談在金山籌建的計畫？

此外，您非常重視佛教人才的培育，可否請您介紹一下農禪寺培育人才的搖籃——中華佛學研究所？

師：農禪寺「中華佛學研究所」的前身是中國文化學院（今文化大學的前身）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，那是一九七八年，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得知我返國的消息後，很希望我能接辦佛研所，在沒有任何經濟支援及信徒基礎的情況下，我接下了這個職務，並得到華嚴蓮社成一法師及幾十位信徒的支持。

第一屆共錄取八位，三年修業完成，其中有一位已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博士。依國內現在學制，佛研所的「碩士」學位並不被教育部承認，但由於這位學生相當優秀，外國學校承認她在佛研所所修的學分，這對我們的鼓舞相當大，其他的學生有的在教書，有的正協助我工作。

可惜經過三屆招生之後，張其昀先生不幸過世了，校方的人事、辦學政策受到影響，佛學研究所受到波及，不許再招生。中華佛學研究所只好改設在北投區的中華佛教文化館，以近六百坪的館舍為所址，再加上兩百坪左右的公寓作為教職員和學生宿舍。

到一九九〇年，已招收了四屆學生，如此先後共計七屆，每屆學生的程度都很好，畢業生中先後有七位到日本深造，分別進入東京、京都、名古屋、筑波等著名的學府，多半都能獲得日本政府提供的獎學金。其中有兩位已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。

由於要貫通經典、論典及佛教原典，佛研所的學生必須學習多種語言，如日文、英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西藏文等。

辦佛教高等教育的目的，是在培養人才之後，由他們帶動更多的人才，無論是國內外，佛法弘揚的層面就會更廣而深遠，不但能使正信佛教受到重視，也將佛法傳遍社會每個角落。

除了中華佛學研究所，為了加強人文教育，目前我們正向政府申請成立「法鼓人文社會學院」，這個目標可能要過幾年才能付諸實現。

現今，我們整個硬體設備要擴遷至金山鄉，此處，我們稱之為「法鼓山」，法鼓山的建設約需新臺幣十二億元左右，目前籌募的款額，距離此目標，還有一大段距離。未來第一期工程的建設藍圖，包括研究所、佛學院、國際禪修中心、國際弘化中心、編譯出版中心、舉辦國際佛學會議、清修安養的環境。

這個藍圖希望成立的是一個完備、均衡發展的環境。我們希望將這裡建設成真正的人間樂土，讓人感覺到生活在現實的極樂世界，到處都是那樣安詳、和平、清靜、安定、光明，有山有水、花香鳥語，不致和現代都市文明脫節，卻能遠離塵俗的煩擾。

房舍將盡量配合山上地形來設計，依著山勢、高度來建，使落成後的建築物，就像山上生長出的自然景觀，一走近就有賞心悅目的舒適感。

希望我們的建築具有時代性，不是在幾十年後就要拆掉重建，而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在三、五百年之後，還有使用與紀念的價值，讓後人瞭解在中華民國的時代，曾有許多人為佛教的化世事業奉獻，以及法鼓山產生的力量與影響。

（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，《中央日報》「星期天」雜誌二七二期刊出）

本文摘自法鼓文化出版《聖嚴法師心靈環保》